

上海教書，他把我送上北火車站滬寧鐵路（當時尚作此稱）的火車，他也頗不放心，恰巧我們等着買車票的時候，遇到一位也到南京的中年紳士，表兄問他考東南大學的住什麼旅館為最近便。那位先生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鼓樓的興臬棧，距東南大學最近，走路在十分鐘之內可到；他並且指示我出了下關火車站的不遠，便有許多馬車兜攬生意，到興臬棧，一人獨坐，不過六角小銀幣，如果合坐，不必講價，只要二角，到棧下車，決不會發生爭論的。我照他的指示，和四個人同坐一車，到興臬棧下來，一路都很順利，看好房間，臥床休息，沒有到過南京旅行的苦便吃到了。那時候的興臬棧雖然在鼓樓一帶很出名，可是陳設却甚簡陋，和上海的小旅館還不能相提並論。房中的設備，只有木板床，上舖草席，小桌一張，小椅和臉盆架各一，此外便無長物了。初出遠門的我，不知道此類旅館的規矩，要蚊帳、棉褥，都聽客人使用，不過是要另外算錢的。我既不懂其規矩，又不好多言多語，只以為大概是夏天的關係，所以無其他設備，也並不多囑囑，叫僕役以濕布拭拭席子，晚飯後便擁榻而眠了。夜晚，蚊子雖不甚多，而臭蟲却在無聲無息間，擾人殊甚。但覺癢處，一搔便是一個大疤而癢仍不已。這纔嘗到了外人所講的「南京蟲」的滋味，三天考畢，我已滿身瘡痍。揚長而回，南京蟲的為患，慢慢平復，而蚊子的災患，却大大的發作了。

原來我所受刺的蚊蟲，是一種厲害的瘧蚊，間日一發，冷時如入冰窖，重被在身，仍然抖顫

不已；冷勢方過，頓轉高熱，知覺全失，嚙語不已，有時只是滿身火燙地沉睡不醒，使我的祖母、母親與祖父為我流了不少的眼淚。治瘧疾是特效藥的，而我們鄉間却無法可得，也沒有人知道，幸而伯祖父是一個有辦法的中醫，他知道常山草藥可治此病，於是我每天服用此等藥湯，十天以後纔逐漸減輕，一個月以後纔算停發，而我已形消骨立，行走都需人扶持了。將養了幾乎兩個月，纔回復健康。在我養病的時候，却又發生了孫傳芳以秋操為名而截擊南京，東南大局一度發生騷亂，家人知道了學校有休學的辦法，於是令我休養半年。所以我考取了東南大學，十四年下學期並未上學，到十五年春季纔消假報到。

國民革命之友張謇

我投考東南大學的時候，實際上和我讀中學時的所聞，已大不相同了。佐理郭秉文校長而為主持校務中心的劉伯明先生已經去世，郭先生也和軍閥齊燮元的關係密切與口字房失火而停辦工科，被人指責甚烈。致郭校長不能安於其位，而由蔣維喬竹莊先生代理其職務。我投考東南大學的時候，便是竹莊先生代理校長的時候。

郭先生和齊燮元往來甚密，其內部情形，我們不甚清楚，在我進入東南大學以後，纔知道校內一座比較新式而宏偉的建築，叫做孟芳圖書館的，據說孟芳是齊燮元父親的號，這座圖書館的建築經費，便是由齊燮元的壽儀移捐而建的，其書額則為南通張季直先生的手筆。「孟芳」二字及「南通張謇題」五字，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

東南大學改為第四中山大學後，始行除去。郭校長與軍閥勾結，這大概是唯一的事實吧！工學院以口字房失火和科學館建築尚未完成而停辦，引起部分工學院教授，特別是楊杏佛先生的反對。楊杏佛先生是國民黨的同志（後來據說很左傾），因而親向國民黨的很多名教授，都因此而離開了東南大學。十四年春，國民黨要員都集合於當時尚稱為北京的北平，看護國父的病。據說楊杏佛也在，他向汪精衛陳說了東南大學的情形，由汪精衛轉告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章士釗下令免除郭校長的職務，發表時任大同大學校長的胡敦復先生為東南大學校長。部中並派了某陪同胡敦復前來接收。那正是我投考的時間。只聽到若干考生竊竊私議，謂昨晚發生風潮，把一個教育部派來的職員和新校長趕了出去，新校長被捆在馬車後面的腳踏板上，從後門出石婆婆巷而去，狀甚狼狽云云。我也不顧這一切，還是考我的試，也不跟他們談話，問問詳細情形。今日思之，實在是糊塗之至。

我們今天平心而論，郭校長在軍閥把持下的江蘇省，要把東南大學有聲色的辦起來，不僅可與國內第一流大學並駕齊驅，而且還要蜚聲於國際，那是需要大量的經費纔能辦得到的。那時候的教育部，窮到連部內職員的新水都發不周全，國立大學常常幾個月發不到一個錢，致使教授先生們撈腹從公，常常鬧着向教育部要錢，而軍閥控制下的中央政府，對教育經費實在有心無力。幸好那時候的錢還經得起用，所以清苦生活，還可勉強過得下去。郭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在

江蘇把南京高等師範升格為東南大學，而其發展有如此的迅速，經費並不見得怎樣的支絀，這當然是靠郭校長和軍政教育乃至地方紳士的聯絡有方，纔可以辦得下來，這是必然的。齊燮元是李純的部將，屬於直系方面的，而李純便是率領其部隊，進入江西，擊敗二次革命中湖口起義的李烈鈞部隊的人，國民黨同志們對軍閥禍國，自然恨之入骨，對齊某當然啾恨更深。當時江蘇紳士的領袖是張謇，把持教育界的學閥們是所謂省教育會派，後來演變而稱為職業教育派，張謇似乎

是他們的後臺。張謇在民國建元之始，是革命的同情者，根據各種文獻，最後一任的江蘇巡撫程德潛的轉而支持革命，據說，就是張謇勸說的結果，程氏以其所率領的蘇軍與陳英士先烈等所組成的滬浙聯軍會攻南京而下之，對革命的成敗，關係至深至鉅；清帝遜位，隆裕所簽的遜位詔書，據說就是出於張謇的手筆；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由滬至寧，代表蘇人迎接、國父的，也是以張謇為領袖。所以張氏在民初實在是國民革命的友人。可是，後來張謇却同意聯省自治派的主張。聯省自治是佔有各省地盤而不屬於任何軍閥系統或已失敗的軍閥系統的殘餘，為了保障他們的地位而創出的口號，與國民革命統一全國運動的宗旨不合，張謇和革命運動的不諧和，不是僅僅是這個原因？我們沒有更多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張謇和革命黨不但隔閡，而且處於相反的地位，是事實。郭校長既聯軍閥，又聯學閥，當時國民黨同志對它不滿，是意料中的。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後，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楊

杏佛任大學院副院長，陪同譚延闓先生來校參見開學典禮，他自己說明他反郭的原因，是由於一年之內三選講席，後來藉口「口字房」失火，索性把工科停辦，根本上把他的講席取消了，所以他非反郭不可，然則楊杏佛之反郭，還有私人恩怨在內。

胡敦復先生之就任東南大學校長，東南大學內的國民黨同志接到中央指示，要大家支持胡敦復。國民黨同志鑒於校內同學擁郭勢力之雄厚，而且大家的觀感，彷彿郭校長之被免職，是由胡敦復活動的結果，於是大家一方面本於同情弱者的自然心理，一方面鑒於郭校長過去辛苦經營的成果，即將被人所奪，於是把所有怨氣集中在胡敦復身上，其勢銳不可當。所以當時國民黨在學生中的負責同志便向胡敦復提出警告，認為此時接任東南大學校長，情勢十分不利，請其暫緩進行。但胡氏認為這正是暑假，學生離校者甚多，而且正在舉辦入學考試，教職員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一方面，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以致鬧成一個大笑話，受盡了侮辱，後來也竟是不了了之。

欽天山下東南大學

東南大學位於欽天山下，當成賢街與四牌樓之處，座北朝南，校門正對四牌樓。有兩個便門：出東便門為成賢街之北端，出西便門則為石婆巷，須過一小河，架有石橋。在這樣一個大空間內，在作者進入學校的時候，重要的建築有「孟芳」圖書館，除圖書皮藏及閱覽室外，校長辦

公室在此；有一字房，樓下為教務處、事務處的辦公室所在，有大會堂，後來改稱致知堂，平時作為教室之用，樓上及樓下的一部分，都是教室；有體育館，除樓下有若干教室外，是一個體育術科的和籃球類的活動場所；兩操場在一字房之東，是體育館沒有興建之前的體育術科活動場所，其時也為一大教室；平房宿舍，習稱高師宿舍，在東北部，原為學生宿舍，每一棟稱為一齋，大約共有十齋，每一齋裏面的宿舍約有十間左右，每室額定五人，由於教室不夠，有一部闕為教室，後附飯廳；理化教室與實驗室則在平房宿舍之東，已近東邊的圍牆了。由四牌樓大門進去，有一條馬路，縱貫全校，右側有兩座洋式樓房，稱為中一院和中二院，是附屬中學使用的房屋，左側的圍牆上有一個月洞門，門外有平房兩棟，隔院相對，那是附中的教職員宿舍。中一院的後面為昆蟲陳列所，那是一所平房，儲滿了各種形式式的生物標本。在一字房前，有一條橫貫全校的馬路，其與縱貫路相交處是一所小平房，名為交通處，有收發信件和接受詢問的工作人員在那裏辦公，室內信箱甚多，供同學登記使用，所以這裏常常是人頭擠擠的地方，旁有布告牌，是同學們張貼啟事，如徵求圖書發表意見等的招貼，都揭露在這裏。一字樓的西面是田字號，是附中的學生宿舍，其後亦有飯廳。通石婆巷的那條橫路的北面，另有一座紅色磚造的一字長樓，稱為教習房，是大學部的教職員宿舍。在西北角，須繞過體育館始可達到的一所僻靜而繞有庭園之勝的地方，叫做梅庵，其本身是一座磚牆草頂而

規模並不很大的建築，這是紀念南京高等師範的前身兩江師範校長李梅庵先生的建築物，梅庵先生名瑞清，道德文章與書法，都為世所重，晚年隱居滬上，自號清道人，以鬻書為生，風格之高，由此可見，故梅庵歷南高、東大一直到中央大學，都是同學們嚮往的地方。前有廣場不廣，隙地則時有翠竹數百桿，竹中卓然直立着一棵蒼勁的古柏，據說植自六朝，故被稱為六朝松，中空欲墜，則實以水泥以支之。其西有一亭，翼然出於圍牆之上，則為德風亭，由名詩人及理學家王伯沆先生篆書匾額，即所以頌梅庵先生者。至被火所焚的十字號，作者未見其盛，是在橫貫校路的東端，我入校的時候，正在建築科學館，據說是美國洛氏基金會的捐款，是否如此，我不知其詳了。

以上所說的是校本部，校本部以外，還有若干和學校有關的地方，如四牌樓靠近大石橋的地方，有一所相當寬大的大平房，那是附小的校舍；如東便門出去，過江寧鐵路（南京人稱為小鐵路，實際上為滬寧鐵路的支線，所以並不小），有雜植花卉、苗木的農地，那是學校的農場。在成賢街過了四牌樓交錯口的南左方，有一列大約五至六座的二層洋房，那是男生宿舍。在教習房對面，隔着圍牆和小河的校外，有一個都是平房的院落，那是女生宿舍。那時候，男生多而女生少，其比例恐怕只有十與一罷了；但光是一座女生宿舍，還是不能容納得了全部需要住宿的女生，所以在成賢街上還有一座小小的女生宿舍。這些宿舍，據說不是學校的產業，但是由學校

租了下來，分別給學生住宿，而以宿費抵繳租金，學校對於這些宿舍因而取得全部的管理權，而房主人却可以放放心心的，簡簡單單的把房產出租而坐收租金的利益，此在學校經費不足的時候，不失為好的辦法。儘管學校已經用盡方法，替不是本地的學生解決住的問題；可是，那時的東南大學，學生已達千人左右，此數和現在臺灣的大學來作比較，儘管有如小巫之見大巫，而在當時，已算是規模宏大的大學了。這些宿舍，自然還不能供應所有學生需要，因而在四牌樓、大石橋、老虎橋、成賢街、五卅路（在東南大學的後牆之外），甚至鼓樓、丹鳳街、黃尼岡一帶，民間如有餘房，無不勻出一二間來，租給學生，收取租金，以貼補家用。如有較大的空院落，也有人全部租了下來，隔成許多小房間，以供學生的需用，如模範監獄前面的老虎橋，便有一個叫做安學舍的公共宿舍，專門做我們學生生意，便是一個顯著的例。

以上所說，是學校及其附近和學校有直接關係或間接關係的部分。至於學校直接有關的部分，除以四牌樓為中心的校本部外，在南京城北的三牌樓，還有一個規模宏大的農場，農科各系的大本營，就在那個地方。在上海，還有商科。那兩個地方，終我在中大畢業的期間，都沒有去過，其內容也就無法詳述了。

文科科龐大而複雜

東南大學的時期，各系所屬，不如現在所稱的院，而稱為科。當時校本部所有的科，佔着全

校的大多數，如文科、教育科、農科的一部分如生物系，都在校本部，原有工科，其時已經停辦。農科的重要部分在三牌，商科則在上海，以適應其實習上的需要。好像還有醫科，也在上海，我就記不清楚了。不過中央大學時期是有醫學院的，不知道是新創設的？還是東南大學原有的醫科改的，那就不清楚了。

作者是從一所富有泥土氣的舊制中學畢業出來的。那時候的中學教育，雖然設有學監舍監，但是他們的職務好像專門是找學生的錯處的，海門中學算是一所負有相當的盛名的學校，可是就沒有各級的導師，對學生的未來造就，予以適當的指導。除了若干成績優異學生被任課教師關切外，其餘學生，都靠自己的暗中摸索，不知道走了多少的冤枉路，還找不到合適的出路。不知道其他中學是否如此？要是都是如此的話，那真是一種對青年時光的大浪費了。作者算是幸運的一個，有任課老師對我的關切，可是我所去的大學，既不是交通大學，也不是復旦大學，這幾位關切我的老師，也就無能為力，也只好讓我暗中摸索了。

我初進東南大學，包括各種學科的大規模的大學，到底學什麼好呢？這簡單的答案，當然是跟我的興趣有關。可是，我的興趣如此的廣泛，文科科各系，幾乎都是適於我的興趣，即教育科與農科的各系，也是如此，於是我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大有手足無措之苦了。好在我是舊制中學畢業的，依照當時的規定，舊制中學生進入大學，先讀兩年預科，然後進入本科，再讀四

年畢業。這一方面，給了我一個猶豫的機會。事後發現這個機會如予利用，對我不利。因為那時舊制的預科，已近尾聲，雖然設有預科學生修習的科目，但是執行並不嚴格。而我到了學校以後，纔知道預科的學分，我已經憑入學考試的成績，送到了十五個，即預一英文十二個學分，高等代數三個學分。我到學校的時候是單槍匹馬，可是進了學校，遇見了一位中學比我晚一學期的同鄉同學朱君，他的叔叔是在註冊組成績股服務多年的老職員，於是我有如黑暗中望見了燈塔，向這位朱先生請教。朱先生對我的成績甚為熟悉，他指點我，照我的情形，四年畢業頗有可能，每一學期選足二十學分（體育學分不計在內），如果成績好，多選兩個學分，系主任可以同意的；不過他對我應讀何科，不能有具體的主張，建議不妨預定一個目標，作為試探，如果不合興趣，然後轉系，以一年為度，吃不了虧的。

我照着朱先生的指示，暫以數學系為目標，除了選幾門預科一年級的必修科外，還選了一門數學系的學科，解析幾何。這個試探，基於我在中學對算學的興趣和成績；同時，當時的東南大學，至少在名教授方面，已經和我中學時代所知道的情形，業已面目全非；只有數學系還很完整，如熊迪之、段調元、何魯之等國內有名的數學家都在系內，這些，我都是假定要入數學系的基本因素。所以我第一次選好了，總簽字的是文理科主任孫洪芬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和藹可親的名化學家。可是，讀了一個月後，我發現數學於我不合，甚至中途放棄解析幾何的學習，臨時

選了一門杜工部詩來湊學分。杜工部詩的教授，便是我上面所說家額德風亭三字的王蘊伯先生。預一英文，稱為甲級英文，我既免讀，乃選一位新來的女教授，原在滙文女中任教而長於西洋歌曲的女高音聲樂家梅經香先生所開的乙級英文，因為是晚了半年而中途插入的，所以學習時感到有點吃力，總算勉可應付，此外我選的課還有趙鈺鐸先生的各體文選（必修科）等，這一學期，總算馬馬虎虎的過去了。

文科科，當時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科，在理科方面有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地學系等，在文科方面有中國文學系、西方語文系、哲學系、史地系等，而社會科學的政、法、經系竟也在文科科中，而且包括政治、法律、經濟三種主要科目於一個系內，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所以我不讀數學系而入文科科的其他各系，不算轉科，在學分方面並不吃虧。這一個學期過去了，第二個學期即民國十五年的下學期，文科科的主任改由盧晉侯先生擔任，而我要進入那一系的決定階段，却又迫近一步。

東南大學在十五年的下學期，教授陣容有了若干進展，雖然相傳已久的桐城嫡派古文家姚永樸仲實先生始終沒有到校，以詩文著名於當時的南通范當世伯子先生的哲嗣彥矧先生却離了校，范先生在十五年上學期是講授傳記文學的；可是散文專家與化學詳審言先生却是來校授課了，他講的是賦；各體文選的教師趙先生也離校了，接他的常州籍的舉人謝恩灝先生；外國語文系換了新主任，張敬海先生到校任職，我的乙級英文也

改選韓湘玖先生的課，韓先生不久之後便做了張敬海先生的夫人。我讀了王伯沆先生的杜工部詩，使我對原已興趣很深的中國文學又加深了興趣。這一年的下半年我又旁聽了全國唯一的詞曲專家吳梅瞿安先生的詞學通論幾次，雖然沒有使我對詞學加深興趣，但對於中國文學之美，却又增加了若干認識。而是年夏季的清華留美的考試，每種只有一名，我的同鄉范存忠學長就得到英文的第一名而出國去了，這對我是一個大大的鼓勵。所以我當時想要進的系，徘徊於中國文學系和外國語文系之間。至於當時的史地系，名教授星散，雖然在是年下學期五四運動健將羅家倫志希先生來校授課而聲譽稍振，可是沒有引起我的注意。後來，我進史學系，而且在該系畢業，在那時候想都沒有想到。

政治活動吵鬧鬧

民國十五年秋季，國內局勢最大的潮流是國民革命軍北伐，作者對於三民主義和革命運動，在高等小學讀書的時候，已深受恩師沈先生的影響，沈先生當時看的報是上海民國日報，懸的校訓是「國父手書的「天下為公」，因此我對革命向來極為嚮往。可是當時的我只是十三、四歲的大孩子，而且在沈先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教誨之下，畢竟以功課為重。在中學階段，被數、理、化等課壓得喘不過氣來，而我對文史諸課又不肯放鬆，所以格外埋首於課業中了。及升大學，雖略有餘暇亦無機會參加當時有類於吵鬧鬧的政治活動。可是，對於革命軍的

臺北市公營當舖

滿當期六個月
月息一分五厘

實行民生主義 估價公平

- 總舖：臺北市中正路一五三七號（空軍新生社附近）
公車 062549312737 工專站
- 城南分舖：臺北市南昌街一段一三〇號（福州街口）
公車南東01福州站
- 城中分舖：臺北市懷寧街八巷七號
火車站對面即懷寧街開封街口
- 城西分舖：臺北市西寧南路二八一號（貴陽街西寧南路口）
公車 901325312030 西49中華路站
- 城北分舖：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一六二號（民族路重慶北路口）
公車 292北92633 民族路站
- 建成分舖：臺北市天水路五十四號（延平北路天水路口）
公車 139北021412 延平一站
- 大安分舖：臺北市信義路四段二九七號
公車 19433720303139（三張犁站前）
- 松山分舖：臺北市松山區中正路一二九之二
公車 3946 松山站、6 終點（松山區公所對面）

保管安全
增進社會福利

北伐，希望他們愈早克復南京愈好。當時的報紙，對吳佩孚的節節敗退，孫傳芳勢力下的江西軍事的革命軍勝利，蔣總司令親至南昌萬壽宮指揮軍事，孫軍謝鴻勳師長在修水重傷以及孫傳芳偕蔣百里以江新輪為總司令部，進泊九江指揮等消息，報紙照樣刊載，所以同學們對於大局的發

展，大體上知道得很清楚。而南京城內，雖然安靜如常，但孫軍的調動却很頻繁，入夜似乎宵禁甚嚴，孫軍對東南大學的國民黨活動，似乎已曾注意，曾以突擊檢查的方式，搜查成賢街宿舍，有成烈等兩位同學被捕，不久便成了仁。我對於這種變局，與其說是恐懼，無寧說是歡暢。可是

，那時候忽接家報，謂母病久不痊癒，需人伺候，囑我速回。我只好向各任課教授請求簽署請假單，向學校請假，將箱籠書籍寄存在同鄉沈先生處，就輕裝而回，結束了這一年的大學生活，也就是東南大學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及明春再來，南京與學校，都已面目全非了。

58年度青年文藝獎得主

黃海三（黃炳煌）著

一〇一〇一年

出版了

每冊定價十六元，內文用大康六〇磅印書紙印，封面用一五〇磅布紋銅版紙外加精美塑膠套，一部科學性、哲學性、幻想性、寓言性的小說，由梁子衡作序，附專論「人與未來世紀」一篇。在太空時代人類應有的覺醒。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本書。劃撥一五一一四九帳號特價期間，每冊十四元，附郵票寄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廿八號亦可。新亞出版社總經銷，全省各書局有售。